

王瑜◎著

重审与重构

——现代文学史观与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14057915

I209.6
112

重审与重构

王瑜◎著

——现代文学史观与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研究



北航

C1742554

I209.6

1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审与重构:现代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研究/王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61-4266-0

I. ①重…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
IV. ①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90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

刘知幾在《史通》中曾提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尤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则矣。如有才而无学，犹亦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尤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①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的书写对“史才”、“史学”的强调和突出较为明显，而“史识”——“对历史编撰的独立见解和观点”的被重视程度较之“史学”和“史才”稍显薄弱。刘知幾眼中的“史识”也只是“正直”、“善恶必书”层面的要求。有学有才固然是历史书写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但以现代治史理念看，恰恰是“史识”在历史的撰写中起着核心的纽带作用，它连接起散存的历史材料，使之成为系统的整体并从中找出规律，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言的史观。具体到文学史，这个概念是从西方舶来的。由于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学语境，加之个人认知的差异，导致人们在文学史的编写中，对它的理解有着较大的不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现的时间较之中国文学史要晚一些，对它的认知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不同形态中，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文学史观在治史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文学史观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同时也是当前探讨中的薄弱点，相对于作家作品和思潮等方面的研究，文学史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文学史观的探

^① 《刘子玄传》，见《旧唐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

讨有巨大的深化拓展空间。

就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较早出现的现代文学史学研究专著。该书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就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关注。2008年，黄修己修订了《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比较而言，此次调整改动不大，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概括更为合理客观了。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主要考察了新文学运动以来不同时期的史著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等，先后梳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新文学史著作，不仅涉及我国大陆地区出版的“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还考察了在我国港台地区及海外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从关注的视野看，涉及范围之大，参考资料之多是同时期的研究著作很难做到的。可以说，这本著作的特色是建立在作者对新文学史著作广泛阅读和系统评述的基础上，较早且比较全面地勾勒出新文学史编写面貌的研究作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详细考辨各史学著作的前提下概括出了指导新文学史书写的几种史学观，主要包括“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20世纪中国文学”等。在修订本中，黄修己将“阶级论”和“新民主主义论”合并起来考察，取消了不对等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使其概括更为科学。

黄修己的研究方法影响了一些研究者。任天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就是一例。《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同样考察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的相关新文学史著作，并在介绍不同史著的“特色”之后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写中的作用和影响等做了定位，但它仍是一部偏重于介绍性的学术著作。骆寒超在该书“序言”中曾指出，“作为学术研究基础的材料，作者们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翔实，并且还能综合、全面周到。可以看出，凡20世纪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以及有关学术论著，现代文学综合性史料丛书等，大都被收集起来，纳入进他们的研究视野了”。^①尽管与黄著有着相近的研究视角，并不代表此书的学术分量受到影响。任天

^① 骆寒超：《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石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在具体史著的评价上往往能别开蹊径，论述得当，在价值层面上并不低于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除黄修己、任天石侧重于对已有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梳理评述式的研究方法外，还有一些学者着重从理论建构层面拓展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的新空间，在另一维度取得建树与收获，形成并立之势。其间，朱德发是较为突出的一位。朱德发的《理性思维与文学史观》、《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及其与贾振勇合著的《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是颇受学界推崇的佳作。在《评判与建构》中，朱德发详细梳理了当前文学史学的研究状况，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理论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朱德发的认知并没有停留在此层面上，而是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及“现代国家文学史观”的建构诉求。总体而言，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和“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核心理念的提出是对已有学科的一种根本性超越。它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旧”、“雅”、“俗”之间的人为划界，更吻合当前史学发展的趋势。除朱德发理论形态上的构建外，魏崇新、王同坤、葛红兵、陶东风和董乃斌等人亦颇有建树。魏崇新和王同坤的《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葛红兵的《文学史形态学》和《文学史学》、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钟优民的《文学史方法论》等都是文学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董乃斌、陈伯海和刘扬忠合著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洋洋洒洒三大卷，涉及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时期的编写历程及特点，对现代文学史学的研究提供了相对详尽的参考资料。同时，董乃斌对文学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亦做了较好的探讨，《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一书尽管不是专门论述现代文学史学研究著述，但其从“本体论”、“类型学”、“范式论”、“规律与方法”、“史料学”、“编纂学”等角度为文学史学研究勾画出的基本研究层面对现代文学史学研究有着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

如果说现代文学史学当前存在着两种研究方法，即以黄修己为代表的侧重史著梳理评述型和以朱德发为代表的侧重理论建构型的话，本书将主

要关注理论形态的梳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侧重史著梳理评述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对较大的成就，但理论上的梳理则不然，除朱德发是系统地就现代文学史学做研究外，其他理论建构者如葛红兵、陶东风、钟优民、董乃斌、陈伯海和刘扬忠等大多是在谈文学史学，侧重点是整个中国文学而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治史有一定的可借鉴参考之处，二者的研究对象也有互通的空间，但现代文学较之于中国文学的异质性亦不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可以互为研究参考，但随着研究的深化，系统地探索中国现代文学治史的诸多理论问题亦是绕不过去的研究重点。本书是以现代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研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在史著梳理评述型研究方式和理论建构型研究方式之间找到一定共通之处，进而反观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中理论与实践是如何结合联系的。因而，尽管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评述已有多种，本书并没有忽略对重要著作的关注，而是试图选取不同史观对应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论析，力求建立起理论和文本研究的互动，使理论的研究通过文本的阐释落到“实处”，同时也使相关著作在理论的烛照下被更合理地认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具体论述“新民主主义论”时，虽然其是现代文学史编写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史观，但深层次的挖掘必然会涉及诸多敏感的问题，本书避重就轻地加以阐述，可能留下了一些不足，有些遗憾但也在所难免。

从政治化书写到对文学性、人性等问题的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这种转向的背后尽管与中国政治语境的变化有关，但海外研究者撰史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是一门专史，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本论题要关注的，但鉴于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本书将其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放在一节加以探讨，并没有违背论题所指的规定。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	(1)
第一节 历史、史学与文学史	(1)
第二节 文学史与文学史观	(7)
第三节 现代文学史观	(16)
第二章 进化论及其主要书写实践	(27)
第一节 进化论和进化文学史观	(27)
第二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与中国现代 文学史的编写	(40)
第三章 阶级论的文学史观及书写实践	(51)
第一节 阶级论、阶级论文学观的中国传播及阶级论的文学史观	(51)
第二节 阶级论的书写实践 ——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 初稿》及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为例论析	(64)
第四章 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与“20 世纪中国文学”	(77)
第一节 现代性、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辨析与《中国现代文学 三十年》的编写	(77)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文学”及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	(96)

第五章 不同的声音

——周作人、司马长风与夏志清的探索 (111)

第一节 循环论？

——由《丛刊》几篇文章看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读解的“误区” (111)

第二节 司马长风与夏志清的探索 (123)

第六章 理论形态上的两种文学史观 (147)

第一节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及其文学史观 (147)

第二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史学价值及其研讨的
局限与反思 (157)

第七章 21 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状况及热点话题 (172)

第一节 众声喧哗

——21 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史观研究 (172)

第二节 文学史的政治化书写 (186)

第三节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198)

第八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文史观建构初探 (206)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34)

第一章 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

文学史既是文学学科知识谱系中的一种存在形态，又与历史学科各种史的书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在了解与认知历史书写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史与其他门类历史书写的不同之处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知文学史。具体到指导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观，在中国古代留存的书籍文献中，早就有它的相关记载，但对之做系统关注与研究的时间却不长。由此，文学史观在不同的时期或隐或显地有着不同的表现样态。现代文学史观是伴随着外国学科思想的传入，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逐步出现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二字可以是一个时间上的所指。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是一门独立学科，现代文学史观亦可特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持有的观点看法等。

第一节 历史、史学与文学史

历史学是它的时代的孩子。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长期以来，有关历史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的焦点。人们试图弄清何为历史但似乎又总是无法言说清楚。我国台湾学者郑櫟生认为：“历史，广义地说，

是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它可分为自然发展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① 万斌、王学川提出，“根据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历史’一词应该有三重含义。一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过程，即自然界和社会已经发生而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指已经进入历史认知视野，并通过各种文字、材料、口头传说保留、整理下来的历史事件和过程，这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又不能脱离历史认知的主体；三是指对于历史和历史事实研究和通过这种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这是历史认知和研究的结晶。如果我们对‘历史’这三重含义再做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第二重含义和第三重含义，已不是历史的本意，而是和历史密切相关并由历史衍生推演出来的，并且构成历史事实和历史学的基本内容。只有第一重含义，才再现了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乃是历史概念的真实规定”。^② 梁启超认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③ 李守常则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得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它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纪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纪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④ 在此基础上，李守常提出了他对历史看法。他认为，“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诸如此类的定义概说学界有多种，兹不枚举。从上面几位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理解看，它包含着不同层面的问题。就郑樵生和万斌、王学川的论述看，更为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其中，

① 郑樵生：《史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 万斌、王学川：《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④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4—75页。

万斌和王学川在对“历史”界说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历史学”的概念，并就二者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区分。梁启超突出和强调的是历史的功用，他认为为仅仅“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是不够的，还要“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实际上已经是类似于万斌、王学川所言的“历史学”了。李守常将历史界定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则更多突出的是“社会史”，更看重社会演化的进程和意义，至于自然界的变化是否也可以引入历史的关注视野则不在他的思考内。李守常的这种理念可能和他的信仰有关。

由此，不同学者的不同论述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凸显的是“历史”一语的复杂性。简而言之，“史”字应该有不同层面的所指。笔者以为，如果就“历史”词语形态的存在看，它更多地指向过去——一种已经消逝的曾经存在；如果就“历史”的知识谱系考察，则它更多地是指一门学科形态和对已经消逝存在的研究和追寻，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如果就“历史”的文本存在——历史学的人文或者是历史的社会科学知识形态而言的，它的本质可能更多地关及一种叙述；同样，如果把作为知识谱系的历史同特定的书写时代联系起来，其在传递知识的同时更潜藏着一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为特定政权服务的潜在诉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可能就是一种工具。当然，不同的理解代表着对“史”字内涵不同侧面的认知。事实上，不管怎样看“历史”和“历史”这个词，我们都承认很难对这个词的内涵做出统一的界定，而且也没有必要做一致的认同，因为作为曾经存在的一种过往的“历史”已经消逝不可复原，而作为知识话语体系的“历史”又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没必要也不可能达成统一认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句话本身有其偏颇之处，但如果历史研究者脱离了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历史”话题本身可能就根本无法存在。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类的话，他的关注点是作为知识谱系存在的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概括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二字是经久弥新的话题，垂垂老矣，却又散发着青春的光芒和热情。也正因为此，一代代的历史研究者

才会抱着“鸿鹄之志”试图穷究“历史”，对其盖棺定论，但却又空怀补天之志，终逃不出“历史”的宿命。从某种意义上看，对文学史的研究和探求亦复如此。

文学史是何时诞生的已无从考证。我们一般把林传甲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的那本《中国文学史》作为由中国学者最早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实际上，早在林传甲之前外国的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日本人古城贞吉等1897年就在日本出版了他的《支那文学史》，此后的一些日本学者相继出版了他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① 中国人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关注和中国的教育改革一样是受了外国的影响产生的，和参考西方教育学科体制的设置有关。我们注意到，晚清学术分科的出现带动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同时也奠定了文学史的教材角色。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张百熙仿日本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不仅导致现代意义上学科体制的出现，同时也带来了对文学史编写的需求。因为教育体制的变革带来的是系统学习的需要，传统的师徒相授式的教学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式的发展。于是，适应现代教育需求能够为大规模的教育所采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才得以出现。中国文学史的这种登场方式导致其存在形态相对单一。文学史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书写，可视为是文化史下的一门专史。作为历史书写要面对不同的读者群，要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向他们讲

① 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讲道：“外国人所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最早为中国学界了解并且最早翻译成中文的，大概是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这也是在日本以书的形式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它出版于1897年（明治三十年），书籍出版几个月后，古城才得以以记者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那一年到达上海的，还有一个叫做藤田丰八的东京大学汉文学科的毕业生，他在来上海之前也刚刚出版了《支那文学史》的‘先秦’一册。藤田与东大几个同学合编的《支那文学史》（以人为目）此时也开始陆续出版，合作者中的笹川种郎，1898年又出版了自己的《支那文学史》，而另外的一位合作者久保得二，在1904年也出版了一本《支那文学史》”（《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另：关于最早出现的中国文学史，学界一直是存在较大争议。卮荣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理论述论》中提及“1900年，曾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英国学者翟理斯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史》，作者自认为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全书分八卷叙述先秦至清代的文学。”（见《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宋文涛则认为，“最早从事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是俄国、日本、英国学者，第一部文学史著系俄人王西里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见《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

述那逝去的过往。在面向普通人群时要有适合他们阅读的史学书籍。作为知识传递的教材和研究者的研究需要同样也应有不同面貌的读本。文学史也不例外，它应该有至少三种存在形态，即面向大众的文学知识的普及读本、作为大学中文系必修课程的教材型读本和为适应研究者研究需要的研究型读本。我们注意到，就中国文学史的存在形态而言多是作为教材形态存在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等诸种条件制约的原因，同时也与促其产生的历史因素有关，在它出现的最初时刻就是作为教材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就当前的发展而言，也出现了适应普通阅读者阅读需要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本，如钱理群等人的插图本等，但此类读物的所占的分量和影响力显然不能和教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相提并论。因而，本书在探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问题时是就教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的。

尽管文学史要归入历史一类，在它的编纂中要遵循历史的研究和编写方法，但这并没有否认文学史自身书写中的特殊性。文学史是对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活动、文艺思潮等层面的记录和评价，必然有自身的一些独特性。我们注意到，就本体层面看，文学史的存在与事件史等历史形态的书写有较大的不同。一般历史研究的本体在历史的发展中是已经消逝的“曾经存在”。作为历史事件在它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后人对其追踪、记录等更大程度上是对其真实性的还原。在还原的过程中，不管是依靠史料还是其他手段，所追求的最大目标是“真实”、“客观”。如果丧失了真实性，诸如事件史等诸多形态史的书写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我们讲“真”是历史的编写第一位。如果在“真”的层面上经不起推敲，诸多历史书写都会成为无稽之谈、痴人说梦，没有任何价值，但文学史的书写与之却有一定的差距。文学史是对文学活动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记录和评价。就其书写的本体看，作为作品形态存在的本体并不像其他史的书写那样受到诸多的限制和约束。当其他史的书写在通过史料极力复原史实“真”的一面时，文学作品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真”的一面。尽管由于版本的不同，可能会有认知和理解方面的问题，但原始史

料的发掘直接就可呈现出作品的最初原貌。由此，其他史的书写中着重强调的“真”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并不具有难以穷尽或难以到达的困难程度。以对中国古代战争史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为例，战争事件具体信息的考证更多是通过文献和遗迹来推测，但文学作品的存在往往更为直观确证着一个作家的文学活动，尤其是宋朝以后。由此，对“真实”的追求固然也是文学史编写的基础，但反过来看，文学史的编写显然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较低”的阶段，在此之外还必然会重视一些编写中的特殊性。文学本身是一种“纸质文本”，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体现，是一种理念形态的存在，只有通过读者阅读体悟等感情的投入才能获得对它的认识。因此，文学史的本体不像其他史的本体那样自身就标志着一种事件的“真实性”。由于文学创作在关注“真”之外还要关注“善”和“美”，导致文学史的书写也要传递出“善”和“美”的价值倾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学史的书写必然要恪守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不是史料的年代学排列，将中国历史上的作品以及其他史料按年代学顺序排列起来，既不能产生本体意义上的文学史（我认为本体意义上的文学史是过去时代人类审美精神状貌的发展演变史，文学作品作为文本结构只是它的符号化形式），也不能产生认识意义上的文学史。史实只有通过史学家本人心灵或思想的冶炼才能成为历史。”^①事实上，这段话比较明确地道出了文学史研究要突出的一些特殊性，即文学史家对“文学性”的把握。

从本体层面考察文学史的研究书写只可见出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之一。本体层面的不同必然导致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差异。就文学史而言，一方面它是历史的，这是它逃不脱的宿命；另一方面，它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具有文学和艺术的属性，这是由于它关注的对象决定的。我们注意到，对文学史的关注忽略了此两点的任何一点都会是对其片面的认识 and 了解。周晓明在“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既是一种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史学研究；但不少人往往重

^① 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视其文学研究的性质，而忽略其史学研究的性质。因此，很有必要大声呼吁：重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性；加强现代中国文学的史学理论建设。”^① 尽管周晓明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当前文学史研究中史学理论薄弱是积习已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尽管需要在文学史研究中重视史学理论，但并不等于可以直接从历史学的其他研究领域照搬照用。我们注意到，对文学史的研究在超越文学局限的基础上拓展其史学领域的研究只是其编写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之后同样要关注其史学中的文学特性，即文学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层面的考察。这有些类似于“否定之否定”，但却是文学史编写研究要最终实现的飞跃。只有具备这样的研究视野，才可能实现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由于不论何种史的书写都离不开特定史学观的指导，史学观的不同往往直接决定着一部史著的面貌，下文将就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做探讨。

第二节 文学史与文学史观

第一本以文学史命名的著作何时出现已难以考究，但文学史或类似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却比较长。“文学史作家作品介绍体系始于公元前3世纪，首见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的《文化界名人及其作品概览》，鼎盛于19世纪。”^② 由此观点看，对文学史的书写已有2000多年的时间。如果说人类对文学史的书写历史已有2000多年，那么国人对文学的发展有意识地总结也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今天可见中国古代最早具有某种系统性‘文学史书写’意义的文献，于上古时期‘文’之源流多有阐述。”^③ 由此，类似“文学史”书写的典籍我国文学研究者并不陌生。如果说《汉书·艺文志》作为一种目录学文献只是附带性地记录了一

① 张岩泉：《“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② 赵复兴：《接受文学史体系结构原理及其科学论证》，见《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③ 李昌吉：《文学史中的主流、非主流与“文学史”建构——兼论“书写文学史”与“事实文学史”的对应》，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

些文学作品和书籍，并不是对文学发展的系统探索，那么，《文心雕龙·时序》篇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文学史意识的体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飘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玮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从刘勰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注意到了不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并有意识地将作品的特点与其所处的时代对照起来并加以考察。且不管刘勰的论述能否经得起深层次的推敲，他这种“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观念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学史“史识”的体现。“虽然在刘勰的时代，他不可能具备文学史意识，更不可能将《时序》写成一部文学史，因而不可简单地将《时序》视为文学史。但不可否认，刘勰在探讨文学兴废原因的过程中，客观上向我们展现了中国文学从上古到南朝齐‘十代九变’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前后相继与不断发展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认为‘《时序》是一篇简要的文学流变史’是有其道理的。”^①

诸多史料表明有关文学史的书写活动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均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有意识地以现代眼光总结文学“历史”的时间并不长。这是因为，现代意义上文学史的出现必然是人们现代历史意识觉醒的伴随物。只有当人们有了一定的学科专业化思想之后，才有可能编写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来。在中国，固然史学是极为发达的，但人们的历史意识同样是“混沌”的。中国历史

^① 彭民权：《论刘勰的文学史书写——以〈文心雕龙·时序〉为中心》，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